

明诗话还原研究与近世诗学重构的新路径

□ 陈广宏

复旦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 上海 200433

当今的明代文学研究已有相当迅猛的发展,尤其在诗文领域,这就对相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尝试在学界已经获得的业绩基础上,重新开展有明一代诗话文献的全面整理,无疑是受到了这样的要求的刺激。当明诗话文献整理步入新的阶段,对于总体上如何推进诗话相关研究,亦自然会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它迫使我们在对“五四”以来传统诗学的现代研究进行反省的同时,重新思考若干较为根本的问题,诸如整理与研究、文献与历史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是有无可能在诗话还原研究的路径上,探获中国诗学重建的范式。

“五四”以来占主流的有关中国诗学的论述,基本上皆属西方诗学视野下“影响焦虑”之产物,相应的,中国诗学即是在西方诗学关注的维度上,依其分类及理路建构自我体系诸层面。不管这种参照是直接的还是隐形的,批判性为主还是建设性为主,与其他中国学术的整理方式一致,以西方学术的系统知识为价值标准,成为中国诗学走向现代世界的一条康庄大道,或者说,成为“五四”以来传统诗话研究的一种范式。然而问题在于,当诗话仅仅被用作按照西方诗学原理来构建中国诗学的材料时,很难说不会出现史料脱离语境、方法与对象不相吻合的情况。而诗话被有选择地充入外来阐释框架,难免会有断章取义、虚饰架空的种种可能。诗话的原本形态因这种抢选而遭切割,其面貌会显得支离破碎,甚而意义大失,许多内涵无法深入、具体地被读解与领会,自身特质亦易被消解。从另一面来看,鉴于西方诗学原理的价值基准,在已有的中国诗学及文学批评史等著作中,诗话被用到的比例其实相当有限,基本上为杨鸿烈所说的那一类受到推崇的有条理之作,就明诗话而言,大概不会超过现存诗话的20%,而大量所谓“零碎散漫”的诗话与已纳入诗话范围之诗格、诗法著述则被弃置不顾,与这类文献资料的丰富程度及自身的完整性很不相称,显然并未做到物尽其用,因而能否充分、全面地发掘其特质,便也

难说有其把握。

目前诗话研究较为迫切的任务,恐怕还不仅是进一步发掘材料、扩大史料范围,尽管我们的数据环境与搜辑能力已有突破性进展,而更应该是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范式。这种转换与更新,当然不是凭空向壁虚构,路径之一,应即是顺着所谓“各还其本来面目”的方向,调整我们的立场,即如何以诗话自身整体的存在为对象,而非仅仅作为建构一种体系的材料,在把握其全部内涵、关系及历史语境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中国诗学的内在构成。

我们现在可以着手做的,应是回到诗话生产、消费的时代,就各个年代层,重新构拟其存在的场域,并从中把握其话语体系及特质。这可看作是一种历史还原的工作。

首先必须对诗话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清醒的认识。以往在将诗话抽象地标举为我国传统文学批评样式的时候,论者似乎很容易忘记,它的诞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明代是诗话演变、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数量骤增,而且体制日蕃。更确切地说,以成、弘为发端,嘉靖中期以降直至明末,在诗话发展史上呈现新的划时代的演进格局。这自然与整个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就明人诗话而言,若以现存230余种为计,嘉靖、万历至崇祯约百年间印制的各类文本,要占到4/5左右,其中诗格、诗法类所谓通俗诗学又在其中占相当大的份额。这显然是明代中后期空前广泛之诗歌消费受众以及诗学下行传播态势的表征。

在这些数量庞大、形态复杂的明诗话中,秉承该文体本质性的记叙逸闻轶事一类仍占相当大比例。与此同时,由于印刷传媒的强大驱动力,令不少精英文人将原来应收入别集的严肃诗论,也以诗话的面目迅捷付梓单行。不管其试图争夺文柄、宣示主张,还是旨在规范、提升大众的诗歌创作,皆意图利用在阅读市场中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引导诗学风尚,由此催生出追求理论品格甚而精严体系的一

支,势力不可小觑。

更值得关注的,是承宋元而来的大量诗格、诗法著作。为满足日益扩展的大众社会于诗歌创作、鉴赏的日用消费之需,以坊间“制作”为主导,利用已有公共资源,加以抄撮增删、分合变换,成为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商业化出版。

考察诗话在明代的生产、消费过程,会发现正因为这个由印刷传媒维系的庞大的阅读市场的存在,构成了一个共时的交流场域,一切似乎变得开放、动态起来,也因而可以看到过去不太关注的方面。由作者一端看其写作、生产方式,集腋成裘的笔记式纂辑,仍相对轻松随意,而出版的便利,又往往令一些受市场欢迎的精英文人随作随刊,衍成层累的复杂文本。与此同时,由书坊编刊者一端考察作品的“制作”、传播方式,无论是摘抄、选辑、专辑、汇编、丛编等正常手段,还是割裂拼凑、偷梁换柱、冒名伪托等小伎俩,为的是高效满足读者市场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固然有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考虑,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广大受众需要的是简捷获取诗歌作法、鉴赏最低版本的信息,故其接受方式,有点类似今天的快餐式消费,非专注投入深度思考的理解阅读,而即是出于获取一般知识或者娱乐消闲的“轻阅读”目的。出版者所要做的,就是利用前代积累下来的社会公共资源,极尽巧取变幻之能事,甚而主动引导时尚流行,以满足营销之需。

倘若进而将明诗话从撰作到接受的各种机制联结起来,我们会看到,此类诗学文献的生产、传播过程,正是其文本意义动态构建的过程,即由作者、刊者、读者及相关交游圈、民间书肆、公私藏书机构等诸多环节在信息的相互交换中共同构建。这个共时态文学话语体系的横截面,也是过去较少注意的。“诗文评”著作当然是文学批评文献主体(现今学者尚扩展至词曲话、小说话的整理研究),然近年来人们关注诸如评点、总集等研究,虽非传统“诗文评”类目尽可涵盖,却也是体现批评家手眼的重要产品。过去除个别经典作品外,诗学史、文学批评史等皆不甚关注并采入,类似边角料,现在尝试正视并加以系统整理研究,应亦不仅为开拓文学批评资料。鉴于自觉不自觉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我们可尝试将这些批评样式及产品看作一个系统,在作者、刊者、读者乃至收藏者之间构成互动的环节,如序跋、评点既是读者反馈,同时又是其他读者的指引;诗文评中越来越多对当代作家作品的品鉴,当然也是一种互动;至于指导、规范诗歌作法,同样直接面对广大受众,而流派之间的诗学主张纷争,其实也是利用阅读市场引导时尚风潮。这样,我们的考察点,相对于原来基本上局限于单一、静态、封闭的文本,无疑有了极大的拓展。并且,当我们将关注的焦点从观念、主张

的提出者一方,扩展到接受一方,显然更能观测到整个社会沉积于下的一般诗学知识与经验的来龙去脉。

以下探讨还原研究中的近世诗学重构问题。之所以由明诗话研究的案例拓展至整个近世诗学的建构,是因为希望以一个相对长时段的视角,在更为普泛的意义上检讨传统诗学自身发生的变化及其研究模式更新的可能。相比较“五四”以来较多将传统诗话用作依照西方诗学原理构建中国诗学的材料,通过将诸多诗话文本置回其生产、传播的过程加以考察,应该说是转换到真正从诗话自身及其语境出发开展研究的一种方法,借此我们或可勉力去除原来局部、封闭、静态利用相关文献带来的遮蔽,文献整理与诗学研究不至于是分开的作业,以求能够以一种全面透视的视阈重新理解该时代的诗学批评实践。

不可否认,以往的诗学史、文学批评史著述所重往往在“成一家之言”的作者一端,基本上由精英文人述论或业已经典化的文本构建,即便是参与文学事务的阶层明显扩展、留存文献极为丰富的近世诗学,亦难以突破其格局。而现在,当我们调整考察诗话文献的角度,就文本制作、传播的各个环节,深入观照诗话所在话语系统生成、交换及改造的动态过程,那么,循其特有的近世性之质性,上述格局应该因面对庞大的阅读市场而发生重大改变。要知道,这种改变,符合其时代特点,它的任务是综合考察诗话的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在同一场域的交互作用,如何共同构建话语之意义,并联结成为一个系统。由此所针对的研究对象也将有所转向,原来被忽视的读者这个维度终于获得关注,由坊间主导“制作”、应对市场需求的大量诗格诗法类著作亦因而会被纳入考察视野。

近世诗学的基盘,是一种俗世化的实践诗学。众所周知,近世诗歌创作所接受的重要遗产,是齐梁以还至盛唐成就的包括诸古近体在内的诗歌类型体系与格式之学,尤其是作为格律诗的近体,对后世影响巨大。正是这类有规则可寻而又充满变数、具有很强实践性的诗体诗型,为近世社会更广大人群对诗的关切并为日用之消费提供了资源,又显露出相当大可待开发、提升的空间。这可以说是近世诗学的一个原点。在这一历史阶段,已经发展成为诗歌批评主要形式的诗话,当然会继续就上古、中世社会已经开发的诗歌与情志表现、诗歌的政治社会功能、诗歌与自然的关系等诸多本要问题进行探讨。然而,如李维在《诗史》中就诗歌创作实践判定“吾国诗学”“蕃衍馥郁于汉魏六朝,至于有唐极矣”,作为历来公认看法的归总,无疑是近世诗学面临的现实,张伯伟教授则将唐代这种诗体诗型之全备大成称作

“规范诗学”的建立和发展。恰恰是这种“规范诗学”，更易于为一般文化程度的大众所接受，在诗学下行传播的俗世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此，正是诗学发展之现实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世诗学最为侧重的关注点，在于导向“作品”。正是近体诗之类的普及导致的诗学俗世化，使得诗歌摹习之格式律成为广大人群的主要关注对象，成为类似技术主义诗学具有支配力的背景。

有鉴于此，我们也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宗唐得古的风格问题，始终贯穿近世社会，成为近世诗学的主线。唐代完成的古典诗歌类型体系，毕竟不是后人抽象而成的口诀规则、平仄声调谱，而是具体的诗人诗作之集成，其源流正变，原各有一副言语，不管是别体制抑或审音律，取何等诗人诗作为样板，实践何种时代风格，事关理想范型的建立。在文学担当阶层进一步下移的明代，作为“小传统”对于“大传统”的一种文化复制，这种理想范型的构建，全息反映了近世诗学的理论向度及构成。

其中处于最基层的，当然是面向最广大受众的诗歌作法之类技巧，从字句、篇法开始讲起，包括声韵平仄、粘对偶等基本规则，关键在示格式、明宜忌，诸多方面可从大量诗法、诗格类著作加以清理。由此而上，则是精英文人尝试规范、提升诗歌消费市场而作的努力，无论创作抑或鉴赏，辨识格调成为最主要的路径与方法；与之同时，则是进一步界定诗体诗型及其表现功能的文体学建设。严羽诗学著作在明代的流行，有其土壤，许学夷总结《麓堂诗话》的成就，即谓“首正古、律之体，次贬宋人诗法，而独宗严氏，可谓卓识。”这种文体学建设包括为严分体制音响而做的诗歌流别之溯源工作，如《诗源辩体》之类，《艺苑厄言》《诗薮》等也有相当篇幅在做这方面的辨析，而此实与树立各体之正典高格密切相关。此外，如修辞上的情景、虚实、比兴、典故等问题，声调上的古律正变或所谓拗体等问题，皆关乎诗歌声容意兴之更为高妙的语言形式的探索。

我们便于开展的工作，应是比较彻底地梳理大量诗格、诗法著作自宋元以来的传承、演变，据以观测作为通俗诗学的一般知识及相关观念如何被定型、积淀，构成什么样的体系，如何发生变异，又如何传播中被简化或改造。这方面的清理与构拟，相对而言，是向来所忽视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进行。

除了加强关注以往不够重视的通俗诗学一侧，在观念上亟须转变的，尚有不可忽视诗话作为整体的存在。具体而言，一是应借助大量诗话文献的序跋、刊藏题记及文本中的相关评点等资料，重建诗学叙论的现场。这个现场，也就是我们所要将相关概念作历史还原的语境。以往的诗学史、批评史著述，

除了运用到诗论家彼此往复的论诗文书之类的文本外，相对不太注意将相关概念界定在一个现实交流的场域中予以探讨。但事实上，诗论家们所运用的相关诗说及概念，究竟是一个苞综广泛的庞大意义系统，还是一个创作或评鉴的技术词汇，明显遇到界定问题，需要根据当时的真实语境给予恰如其分的判定，而不是被随意放大、模糊套用，并用来构建演变脉络及阵营。在印刷出版相当发达的近世社会，诗话文献之随作随刊及其序跋、刊藏题记、文本中相关评点或评论等资料，恰好构成了诗论家、书坊及读者因该出版物而联结的一个实时交流系统。

二是应改变从诗话作品中摘取自己所需信息的习惯，尽量依据各诗话文本呈现的结构体系，及其相互间的变动沿革，合成近世诗学自身的内在构成。如果说，我们将诗学史看作是一系列诗学著作背后一个价值结构及其意义的动态变化过程，那么，即便对我们久已熟稔的诗话著作，亦仍需要依其自身的内在构成及其次第，还原或重建其所体现的诗学标准与价值体系，而不是抽绎其中若干观点、主张，迁就外来的或任何其他间架。以赵宦光《弹雅》为例，作为万历之后自成体系的代表性诗论，其构架的主体部分为雅俗、声调、格制、取材、韵协等类。作者以何种逻辑构成如此序列，一方面当然要从该文本自身寻找内证，如何比诸诗之流风、容貌、骨骼、作用等；另一方面则须据相关诗话的概念、范畴之演变加以考察。早在朱权《西江诗法》所录《诗家模范》，我们已可看到：“体制声响，二者居先。无体制，则不师古，无声响，则不审音。故诗家者流往往名世者，率以此道也。”这是严羽诗论影响下的一般认识，也是李东阳以降强调诗文辨体的基础。那么，至赵宦光在格、调之间的次第变动意味着什么？是根据个人嗜好于价值观所作的调整，还是有所依照对两个概念或范畴加以重释？我们看到，他视“声响”为“诗中第一意”，实有意针对胡应麟辈“不知声响何物”。同样，赵氏在“声调”“格制”之上安置“雅俗”之范畴，以为“诗之全”者，又体现怎样的价值观念与结构变动？据其《弹雅》卷一所述：“体制，格也；音声，调也；色泽，彰彰也。三者各具雅俗，雅俗各有性情。得之者天，修之者人。”可见“雅俗”贯彻才性的统摄作用。同时之许学夷曾引述赵氏“求真”之论：“古人胸中无俗物，可以真境中求雅；今人胸中无雅调，必须雅中求真境。”在表明二人于此观点站在相近立场的同时，又显示这种结构变动或来自抗衡公安派的某种焦虑。

应该说，这是更为艰巨的一项任务。然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沿着历史展开的方式，来重构近世诗学。

■ 《复旦学报》2018年第3期，约15000字